

# 全球

— 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 —

# 变局

林毅夫 等 / 著    王贤青 / 主编

掌握变革时代决策原则 · 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读懂共同富裕关键本质 · 发现中国经济未来机遇

# 全球 | 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 | 变局

林毅夫 等 / 著 王贤青 / 主编

掌握变革时代决策原则 · 理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读懂共同富裕关键本质 · 发现中国经济未来机遇

中信出版集团

# 版权信息

书名：全球变局：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

作者：林毅夫，王贤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2-11-01

ISBN：9787521748758

品牌方：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本书由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言 解读全球变局 探寻新长期主义

王贤青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

今天的世界有点像脱缰的野马，左冲右突、上蹿下跳，很难预判下一站是哪。人们都深刻地感受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像2022年的开局：想不到俄乌两个大国之间还能爆发热战，参战的不仅有士兵、大炮和价值观，还有全球金融、能源甚至短视频平台；想不到美国的通胀率能冲高到9%，美联储要一次加息75个基点；想不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第三年还能使深圳、上海、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防不胜防；想不到长江流域多地干旱，很多湖泊干涸。

这个世界令人想不到甚至不敢想的事情越来越多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不是预判，而是人皆有之的强烈感受。对于新环境，有人用VUCA来形容，即脆弱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也有人比喻为从登山到冲浪。登山时，山是固定的战略目标，你只要制订一个合宜的计划并有足够的执行力就能登顶，至少能一步步靠近。但冲浪不同，你不知道下一个浪从哪个方向来，强度有多大。在冲浪的时代，你随时可能被巨浪打翻，甚至难以翻身。

全球变局真的只是随机游走的事件？我们是否过于关注这个世界的“变”，而忽视了“不变”？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背后，哪些是短期意外带来的动荡，哪些是中长期趋势性变化带来的质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逻辑与传导机制是什么？再进一步，长期主义还有没有用武之地，需要什么样的调整？变局在带来挑战的同时，又蕴藏着什么样的机会，如何把握？

正是基于无数网友这一连串的问号，2021年底腾讯新闻团队和我

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传播中心决定针对全球变局开展一系列的深度探寻。毕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林毅夫等教授团队成员的本职工作之一就是观察时局，研究变化背后的逻辑与方向，提出有战略前瞻力的应对建议。

很幸运，我们的这一提议得到林毅夫教授等十多位老师的响应，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经济学家或管理学家。我们给每一位教授都列出了长长的问题清单，力求获得深入而系统的解答。同时，我们还特别收录了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林毅夫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以及姚洋教授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教授的对话。

因此，本书既不是故事的讲述，也不是答案的堆积，而是教授们手把手地带我们一起解析全球变局背后的原因和逻辑。更有意义的是，我们还可以从中感受老师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林毅夫老师经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老师们心中，比结论更重要的是方法，比方法更重要的是理念和信念。

如果我们只是旁观者，情节越跌宕的剧本越是精彩，但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每一个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认真地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学会应对。毕竟，我们的国家要继续推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下一个百年目标努力。企业和个人也需要认真琢磨变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 第一部分 全球新变局与中美关系

## 第一章 中美竞争的核心与全球治理的关键 ①

【本文根据两位作者在2021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的对话翻译整理而成。】

林毅夫<sup>1</sup>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sup>2</sup>

(1.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2.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从特朗普到拜登，中美经济关系有何不同？

林毅夫：在中国，我们常说，作为一名精英应有志于用自己的所学去造福社会。根据我的观察，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践行这一理念。

我想问斯蒂格利茨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提到现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与特朗普政府时期有很大不同，主要原因之一是特朗普不懂经济学，而拜登政府更了解经济学。但是，我并没有看到美国对华政策在拜登上台后出现很大的改变，特朗普执政时期所提出的关税等政策仍然维持不变。那么，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关系方面产生了哪些不同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非常好。拜登执政已经有近一年的时间，并没有取消对华关税以及其他贸易限制政策。这是因为，在中美摩擦的背后还有其他一些驱动因素。比如美国国内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尤其是在产业领域，失业率高、收入水平低。美国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佳，继而导致了政治方面的问题。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变得难上加难。21世纪初，美国在向中国打开市场的时候，在很

多领域都受到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因此，美国国内担心，如果现在降低关税，会导致相似的情况出现。

我想说的重点是，拜登政府明白，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零和的，对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贸易双方都能获益。并且他们也承认，美国的贸易赤字并非由不公平贸易引起的，而是国内总储蓄与总投资之间不平衡的结果。所以，拜登政府的经济哲学确实与特朗普时期不同。

但是，拜登政府为什么仍然延续特朗普时期的贸易及经济政策呢？原因就在于，现在支撑这些政策的逻辑不再是对经济学的误读，而是拜登政府对经济和政治方面问题的考虑。所以事实就是，尽管原因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

## **中美关系如何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林毅夫：我们是知识精英，应当用自己的知识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国所有的知识精英而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生活福祉。目前，中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是美国的1/6。我们需要继续努力，使这一比例上升到至少50%。到那时，因为人口更多，中国经济体量将会成为美国的两倍。这中间就会经历中美两国换位的问题。

近期有很多讨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换位与矛盾似乎经常导致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我的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使用知识和智慧，来避免追赶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因地位变化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个人认为，只要两国之间没有军事对抗，国家的经济体量大小并不那么重要。使一个国家富有竞争力的应该是公民个人的能力和创新创业的活力。

举例来说，美国有很多家企业，如果说企业规模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那么每个行业应该只有一家企业才对。美国有非常强势且完备的竞

争政策，目的就是确保每个行业都有多家企业可以自由参与竞争。我们相信，许多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才是有利于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同样道理，欧洲是继续让很多国家并存，还是进行更深度的国家间融合并不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欧洲是否保持了竞争，是否促进了创新创业的活力，是否提升了人民的福祉。

这个逻辑可以延伸到中美经济竞争领域。同样的道理是：核心问题不在于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谁大谁小，而在于谁更有创新创业的活力，谁更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才是两国值得竞争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世界上必须有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或者行业内应该有一家主导企业，我对此持否定态度。欧洲、美国、中国都应该有强有力的政策来保护竞争。我不太认同那种认为一国经济体量决定一切的观点。

## **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为何经常学而无益？**

林毅夫：关于这个观点，我想我还没有被您说服。我们都是经济学家，知道贸易是双赢的。两国进行贸易时，一定是较小经济体获益更多，较大经济体获益更少。所以，如果中国的经济体量达到美国的两倍，那么美国将会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更多。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不幸的是，经济政策并不是由您和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来制定的，所以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如此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知识精英不仅应当把知识贡献给自己的国家，也应当贡献给人类和世界。最近大家经常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话题，在这种大变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全球治理方面的变化。比如：在20世纪初的1900年左右，当时的“八国联军”，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它们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总量的50.4%；到了2000年，出现了八国集团，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加拿大替代了解体的奥匈帝国。八国集团的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GDP总量的47%。这意味着，在近100年当中，这8个国家主导了全球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在

20世纪的100年中也非常努力地发展经济，希望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在世界的占比仅提高了3.4%。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以至于人均GDP方面与8个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收效甚微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让我想起了1991年在匈牙利参加一个学术论坛时有幸聆听过您的讲座，是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您的主要观点是，转型国家不应该按照美国所说的那样去做，而应该按照美国实际做的那样去做。那发展中国家无法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原因，是否就在于它们是按照美国教给它们的方法（说的）去进行转型，却没有按照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实际采用的方式（做的）去进行发展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40年前，美国实际做的是非常重视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在推进科研与教育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对外，美国说自己没有那样做。这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美国告诉其他转型国家：你们应当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不要让政府插手任何事；但与此同时在美国，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生物医学研究、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等等重要事件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指出发达国家自己通过实施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实现了快速发展，然后就踢开了那个能使发展中国家爬上去的“梯子”，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所谓的（有限政府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 **如何改善全球治理？**

林毅夫：中国在过去40年能发展得那么好，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给我们推荐的理念和方式去做。

您在经济学领域的成果使我深受启发，您在全球政策制定领域的积

极参与也鼓舞了我。比如，您在联合国多家机构担任主席，向联合国、WTO（世界贸易组织）、WHO（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提出了非常多的政策建议。您的不少政策建议都得到了这些机构的采纳。例如，2014年您建议给深陷债务的国家进行债务重组；面对疫情，您建议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如果这些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实施，我们所处的世界肯定比现在更好。

那为什么您的一些有坚实论证支撑并一定会造福人类的建议，最终没有获得实施甚至采纳？学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世界做出有益的贡献，但好建议常常得不到采纳，更得不到实施，我们该如何改善这方面的全球治理？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什么那些明显正确的政策建议没有获得采纳？以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这件事为例。这是我在2020年10月提出的，如果当时这项建议能得到采纳和实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人类在抗疫方面可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讽刺的是，WTO原定于2021年12月初在日内瓦举行讨论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会议，却因为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流行而被迫取消了。也就是说，WTO当初没有及时采取有效行动，结果影响到了自己。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WHO和WTO当初没有及时采纳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豁免这个提议？其实答案很简单——制药企业反对。制药企业为什么反对？因为它们要从疫苗垄断中获利。销售疫苗给制药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收益，如果疫苗专利豁免实施了，疫苗价格会下降，制药企业的利润也会大幅下降。然而，如果疫苗专利豁免实施了，全球抗疫形势会大幅好转，病毒也不会产生如此多的变异毒株，比如奥密克戎。所以，这是一个“人民”与“利益”相对抗的例子。

不幸的是，现有国际组织架构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极大影响和制约：在知识产权方面是制药企业，在金融领域是华尔街，在债务问题上 是债权机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议题与普通民众距离较远，民众之上有地方政府、州政府、国家政府，更不用说全球治理机构了。因此，让老百姓从全球治理的大局角度去看问题是很难的。然而，虽然大众不去关注，但这些议题如知识产权、债务重组机制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全球变局：经济新格局下的长期主义》林毅夫 王贤青 著.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574.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